

《全球化的悖论》读书笔记

程南 刘晓 徐飞洋

一、内容综述

2008年，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融风暴以华尔街为起点席卷全球，将高举“全球化”旗帜的国家从泡沫筑起的金色舞台上推落痛苦的深渊，金融全球化迎来了最激烈的质疑和批判——事实上，不仅仅是金融体系，整个全球化大厦都面临着榱崩栋折的危险。哈佛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通过大量案例研究，结合已有学说分析，探讨了全球化的界限和方向以及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可能形式。《全球化的悖论：什么样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才最有意义？》一书告诉我们——最优全球化的关键在于更加民主化、自主化的上层建筑。

全球化的历史经验

回顾第一波全球化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市场的良好运作离不开合理的上层建筑，国际贸易也是如此。但为国内贸易提供支持的国内政治却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市场，自由贸易并未带来想象中的巨利。同时，自由贸易微薄的经济利益背后是巨大的收入重新分配和社会制度的让步。

国际市场需要全球化社会体系的支持，其运作又使各国的社会体系发生冲突——这就是贸易全球化的根本矛盾所在。考虑到这一点，国际经济秩序就需要平衡国际经济需求和本国社群需求，即实现全球化和民主政治的兼容，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一个优秀的例子。在该体系下，全球化让步于民主政治，各国在符合自己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参与国际贸易——一种“温和的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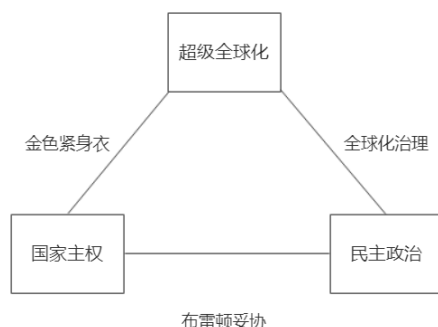
与此不同的是后来的世贸组织倡导的深度一体化，各国政策空间被挤压，自然也就无法应对自由贸易带来的高额社会成本。同时，在资本流动成为常态后，必要社会基础和全球性监管体系的缺乏导致了危机的频繁发作和广泛传导，美国的次贷危机便是最惨重的败仗。

全球化的双刃剑角色

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一分为二：工业化的核心国和提供原材料的边缘国，全球化巩固和加深了二者之间的鸿沟，形成了一个地理位置和自然天赋决定国家经济命运的魔咒。但其中有一个例外——日本。日本将政府支持和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界结合起来，在战略上巧妙地利用了市场和政府，引导本国经济走出天然资源的迷城，实现多元化。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全球化为己用的前提是良好的上层建筑，而非一味地降低国际交易成本，比如合理地竖起贸易壁垒来保护萌芽工业。

全球化的新时态

国内民主、全球化、国家主权无法三全其美，必须舍弃其一。阿根廷1990卡瓦略改革的最终失败说明了超级全球化最终必须让步于国内政治。民主政治是时势所趋，那么是选择政治一体化的“全球化治理”还是轻量级全球化的“布雷顿妥协”？



全球化治理有三种形式：权力下放派、网络派、社会责任派，但问题在于缺乏一套清晰的问责制度。以欧盟为例，欧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一体化，但其民主制度并不完善，政治一体化难以实现，矛盾频出。欧盟说明了要建立一个能够支持深度经济联盟的上层建筑极其困难——一个凌驾于各国政治上的机构并不现实：各国偏好不同、国情不同、具体执法难度不同，无法设立国际性的标准。其次，即便不要求设立统一标准只要求提供信息，信息获取成本过高、信息失真扭曲、利用信息差钻营等问题又会出现，标签和认证在解决全球经济的治理问题上只能扮演一个有限的角色。归根结底，全球化治理无法突破政治身份、社区组织的国家化地区化。

探讨至此可以发现“布雷顿妥协”才是三元悖论的最终归宿。资本主义即将到来的第三阶段需要我们做的实质上就是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注入 21 世纪的新内容。作者提出了新式全球化的 7 条基本纲领，主要表明了：市场需要植根于多样化、民主化、自主化的上层建筑，国际经济协定既要能相容于各国的政策，也要能协调各国之间的交互。作者也以中国为例，展望了全球化的新秩序。

二、三元悖论和全球化治理的反思

在《全球化悖论》中，作者反复提到有关超级全球化的三元悖论，并用大量章节和案例去证明。那便是国家主权、民主政治和超级全球化，三者不能同时满足，只能取其二。超级全球化和国家主权同时满足，意味着各国都穿上了一身金色紧身衣。因为在超级全球化的世界中，交易成本被废除，无论是商品还是资本都能够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国家主权存在的意义便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政府的存在只为保证世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同时，一切的市场规范准则都由全球经济来指定，民主政治一定不存在。若是保留超级全球化和民主政治，则意味着放弃国家主权，实行“全球化治理”。用一个统一的全球性的上层建筑来代替各国的上层建筑，使各国的法律、监管等标准都趋于一致使得各国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为零。尽管国家的政治功能保留，但各国政府的权力会被凌驾于各国之上的全球性机构大大削弱。而若既想保留国家主权又想拥有民主政治，则超级全球化必将成为泡影。更加通俗易懂的解释便是超级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自由劳动，资本为了逐利势必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流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而无法流动或流动成本高的国家面临着更强的就业竞争压力，且资本大量外流对本国的企业扩大再生产产生极大影响，本国人民会通过民主政治来反映自身的利益从而反对超级全球化，并通过国家主权来表达人民的意愿，超级全球化受阻。若政府不理睬人民的诉求，继续义无反顾地推行超级全球化便是将民主政治置于不管不顾的地位。或者政府可运用财政政策对遭到损失的人民进行补偿，但此时国家已经丧失掉了部分国家主权，政府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器，而是为超级全球化服务的机器。

国家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具体表现为具有国家主权的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本国的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国家形式，组建政府等，且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处理本国的内部和外部事物，其他任何国家无权干涉和侵犯。国家主权对于任意一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象征。然而超级全球化却与国家主权存在着冲突。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挑战着一国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各国有着自己专属的一套监督管理经济的法律法规，而跨国公司在海外开疆扩土时是受国际法直接管辖的。国际法常有与国家内部法律相冲突的情况，这就加大了国家对本国经济活动监管的能力。同时跨国公司能够凭借自己的资本、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世界各地寻求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工厂等，尽管为外国带来了相当程度上的经济增长，但也冲击了外国的经济结构。国际资本市场甚至

会限制一国独立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当一国家的经济政策以推动全球化为目的甚至为全球化开绿灯让路时，该国便已丧失掉了经济主权。国际组织的兴起同样影响国家主权，尽管国际组织是没有直接行使主权的权力，但是近年来也获得了优先于国家主权的权力，国家必须得向国际组织让步和妥协。不仅如此，在很多国际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西方大国，他们相交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话语权，能够通过国际规则和议题的制定干涉话语权较弱的国家，从而威胁一国的国家主权。

“主权过时论”主张全球化治理，彻底地放弃国家主权的概念。然而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这条路都走不通。从理论上讲，全球治理的困难根源在于不同社会的喜好、情况和能力都不大一样。建立一套适合全球各地的“全球性标准”用以解决劳工制度标准、安全和健康标准、监管体系等，听上去像是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实则不可能办到。各个国家有着充分的理由去拒绝着这一套“全球性标准”。只有各国的政府强制执行才能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现实中，欧盟便是一个例证。因地理位置、文化、宗教和历史上的高度契合而结合在一起，在经济上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统一的欧盟，但其在上层建筑的推动始终缓慢。越来越多国家的加入使得欧盟内部的矛盾愈发尖锐，英国脱欧同样对欧盟产生了打击。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可取，各国意见始终不一致。此外，据调查显示，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并没有因跨越时间和空间上的鸿沟而产生一种“全球公民”的归属感，相反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国家意识。由此，民族国家始终是一国公民的最终归属，政治社区的多样化更多的是当地化而不是全球化。全球化治理存在着上述多种局限，且在长期看来也并非能够被打破。因此全球化治理并不可能实现。

本书作者罗德里克认为无论是国家主权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反对建立在资本自由流动之上的超级全球化。注意，作为一个逆全球化者，罗德里克并不是反对一切程度上的全球化让各个国家回归到原始状态成为一个个封闭的孤岛，而是倡议建立一个基于现状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有节制的全球化体系。

三、中国会成为新的霸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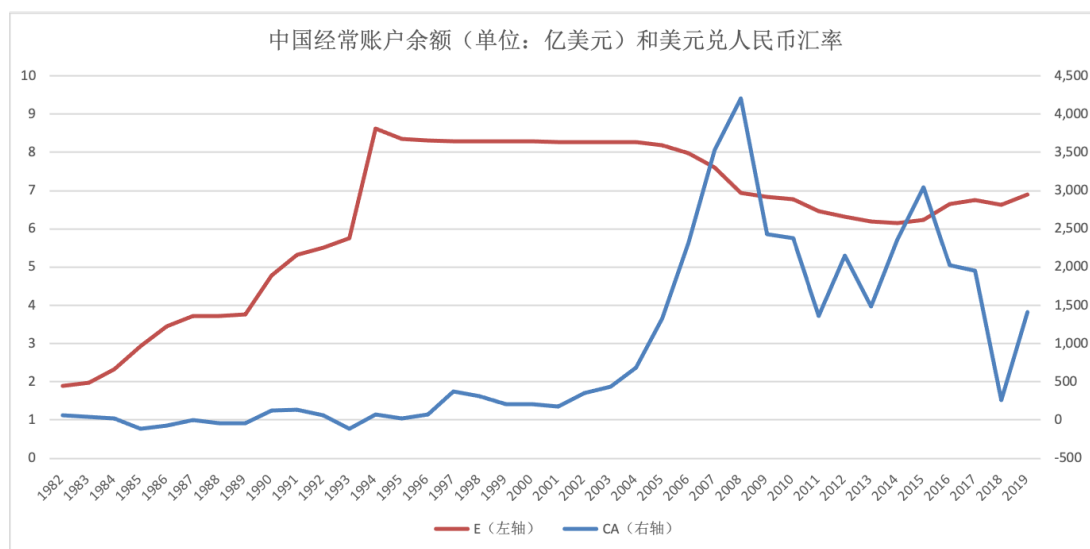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提到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中国是过去 25 年“全球化最成功的例子”，但同时也“体现了全球经济所要面对的所有挑战”。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全球经济发展是巨大的利好，并且在将出口经济和符合本国国情的上层建筑改革相结合、借助经济发展来消除贫困等方面，中国是“最佳榜样”；但另一方面，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对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冲击，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贸易纠纷与日俱增。

作者强调，贸易顺差其只是“中国发展策略的附带结果”。中国发展一以贯之的策略核心在于高速的结构性改革，通过推动工业化，不断提升国家的生产力结构。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八十年代，对制造业的支持体现为贸易限制、投资激励计划、补贴和国内加工要求等政策，并没有导致贸易不平衡；而在九十年代，为符合世贸组织的准入要求，中国不得不降低贸易壁垒、废除补贴和国内加工要求，以货币贬值取而代之——这种情况一定会带来贸易顺差。

根据作者的研究，如果人民币升值到真实水平，中国经济增长率至少要降低 2%，这是中国以及仰赖中国经济增长的世界各国都是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为了解决经济增长和贸易平衡的两难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世贸组织停止使用对补贴等工业政策的限制，或将其归入对发展中国家的豁免条例中，给中国（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策略方面以更大的自由空间；交换条件则是控制贸易顺差，减小对他国的负面影响。这样，新的全球化将是一个“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不必再依赖国际制约或是某个霸主。

为检验作者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解释，我们绘制了 1982 至 2019 年中国经常账户余额（来

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来源：世界银行）的变动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自 1986 年中国正式向 WTO 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复关申请开始，人民币确实实现了迅速的贬值，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CA 账户余额的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潜力。2006 年之后，人民币开始稳定升值，贸易顺差也随之收窄。不过，在我们看来，作者对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的因果分析，颇有为自己的理论辩护的意味。事实上，人民币大幅贬值并不是被迫的结果，而是我们为发展外向型经济而做出的主动选择——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吸引外资，从而承接转出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业链。这并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为突破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们实际上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种阶段性策略，包括曾经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以及现在的东南亚。



作者所设想的多元全球化看起来确实很美好，但遗憾的是，在成书（2011 年）后的 10 年间，全球化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割裂与冲突成为常态，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孤立主义愈加盛行。作者在书中的担忧已然成为现实：“如果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持续下去，美国就很可能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筑起贸易壁垒……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国贸易、总体上反对全球化的政治运动真有可能发生。”

中国会成为新的霸主吗？作者在书中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中国亦无意重蹈霸权主义的覆辙，但在美国已深陷修昔底德陷阱认知的情况下，本可以实现的良性竞争似乎只能走向零和博弈。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已扩展至贸易、科技、金融、外交、地缘政治、国际舆论、国际规则等全领域，对抗层次也不断上升——从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到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根据历史和国际经验，中美博弈无非是四种结局：（1）美国维持世界霸权，中国被遏制，前例参照日本；（2）中美脱钩，形成两大对立阵营，前例参照美苏冷战；（3）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 G2 集团，前例参照欧盟德法两国；（4）美国衰落，中国崛起成为下一个美国。中国应尽量避免中美关系走向第一、第二种结局，而是尽量向中美共治、中国崛起的第三种和第四种结局努力。对此，我们最好的应对是保持历史的大局观和清醒的战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以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开放，同时以二次入世的勇气深度参与全球合作，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是一条失望与希望并行的路，而我们只能一往无前。